

日治時期高雄日人獨資商號的經營軌跡：以山田耕作與「山形屋」為中心

撰文／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博雅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謝濬澤

摘要

日治時期除大型在臺日資外，日人獨資商號亦為殖民地城市商業的重要基底。本文以高雄日人獨資商號經營者山田耕作與「山形屋」為中心，採時間序列方式，重建其自來臺、南下打狗至事業擴張的經營軌跡。文章指出，山田耕作早年由總督府殖產行政體系轉入三美路商會，並在打狗築港、市區改正與新興市街發展的背景下，掌握港灣都市形成所帶來的商機，由受僱職員轉為獨立經營者。其後，山田一方面經營新濱町的零售販賣業，另一方面投入官有林野開墾與土地取得，逐步累積資產，並將店鋪改建為「山形屋」商店。研究顯示，山形屋雖以書籍販售為重要內容之一，實際上呈現兼營書籍、文具、明信片、教育玩具、節慶用具與百貨的複合型態，其經營策略與車站前區位、日人社群需求、觀光商品流通及廣告宣傳密切相關。透過山田耕作與山形屋的個案，可見日治時期高雄中小規模日人獨資商號，如何在殖民地都市發展、政策環境與地方市場之間，形成靈活的經營方式與資產累積路徑。

關鍵詞：日人獨資商號、山田耕作、高雄、山形屋商店、經營軌跡

本文初稿曾於 2018 年「築港設驛 110 週年——19-20 世紀亞洲港灣城市的興起」國際論壇宣讀，感謝與談人陳文松老師及多位師友提供指正與建議。其後承蒙審查者與編委會審閱，惠賜修訂意見並協助勘誤，謹致謝忱。

投稿日期：2026 年 1 月 27 日

接受日期：2026 年 4 月 23 日



Business Trajectories of Japanese Sole-Proprietorship Firms in Colonial Kaohsiung: The Case of Yamada Kosaku and the “Yamagataya”

Chun-Tse Hsieh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Liberal Arts,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Beyond large-scale Japanese capital in colonial Taiwan, Japanese sole proprietorships also formed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urban commercial lif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Yamada Kosaku and his business, “Yamagataya,” in Kaohsiung, and reconstructs his entrepreneurial trajectory chronologically from his arrival in Taiwan and relocation to Takao to the later expansion of his business activities. It argues that Yamada first moved from the colonial agricultural-administrative system into private-sector employment at Samuel Samuel & Co., and then, amid the development of Takao Harbor, urban improvement projects,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urban districts, seized the commercial opportunities created by the growth of the port city and shifted from employee to independent proprietor. He subsequently combined retailing in Shinhamachō with the reclamation and acquisition of state-owned forest and wasteland, gradually accumulating capital and eventually transforming his premises into the Yamagataya shop. The study shows that although books were one important part of its trade, Yamagataya in fact operated as a hybrid retail business selling books, stationery, postcards, educational toys, seasonal festival goods, and general merchandise. Its business strategy was closely tied to its station-front location, the needs of the Japanese community, the circulation of tourism-related commodities, and the use of print advertising. Through the case of Yamada Kosaku and Yamagataya,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how small- and medium-scale Japanese sole proprietorships in colonial Kaohsiung developed flexible business practices and paths of asset accumulation within the interrelated contexts of colonial urban growth, policy incentives, and local market demand.

Keywords: Japanese Sole Proprietorship, Yamada Kosaku, Kaohsiung, Yamagataya, Business Trajectory

- 壹、前言
- 貳、山田耕作的生涯轉折與初期立足
- 參、山田耕作的投資活動與資產累積
- 肆、山形屋之經營型態與商品結構
- 伍、結論

壹、前言

在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時期的經濟發展過程中，除了來自日本財閥與臺人資本的投入外，中小型的在臺日商亦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根據須永德武所整理 1938 年的統計資料，指出法定資本額在 500 萬圓至 1,000 萬圓的企業，臺人資本與在臺日資占 66.7%；而資本額介於 100 萬圓至 200 萬圓的企業，臺人資本與在臺日資占 92.6%，可見在臺日資的比例不低。¹ 除此之外，當時也有許多規模在百萬圓以下的中小型獨資商號存在。根據 1939 年的統計，總數高達 86,424 家之多，其中不少是由在臺日商所開設的；經營存續時間為八年以內的獨資商號占總數的 60%，可見獨資商號永續經營的困難程度。² 這些數量龐大但經營時間短暫的獨資商號，如何在殖民地臺灣創業？又採取什麼樣的策略延續他們的經營？是目前關於日治時期在臺日商研究值得探討的議題。

目前關於在臺日商的研究，多數討論集中在臺灣的日本人資本，涂照彥探討日本財閥與在臺日資的主從關係。爾後則有波形昭一、黃紹恆、中川理江、鍾淑敏、林玉茹與陳家豪等學者都先後對於在臺日資的活動進行個案的探討，並關注大型在臺日資與臺灣總督府的互動關係。³ 以上的研究多關注於資本的流動以及企業的發展，對於在臺日商的關注有限。另外，趙佑志的博士論文〈日人在臺企業菁英的社會網絡〉以及其相關延伸

1 須永德武，〈殖民地期臺灣的企業株主構成と財務結構〉，發表於「近代東亞的區域交流與秩序重編」國際研討會，國立臺北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暨日本立教大學經濟學部主辦（2012 年 5 月 26-27 日）。臺北：國立臺北大學人文學院校舍。頁 1-8。

2 須永德武，〈殖民地期臺灣企業的株主構成と収益性〉，《立教経済学研究》，66（4）（2013），頁 57。

3 涂照彥著，李明俊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人間，1991）。波形昭一，〈殖民地（臺灣）財閥〉，收於渋谷隆一編，《地方財閥の展開と銀行》（東京：日本評論社，1989）。黃紹恆，〈日治初期在臺日資的生成與積累〉，《臺灣社會研究季刊》，32（1998），頁 198、211-212。中川理江，〈臺灣日治時期日本民間企業發展之研究：以臺灣煉瓦株式會社為例〉（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鍾淑敏，〈政商與日治時期東臺灣的開發：以賀田金三郎為中心的考察〉，《臺灣史研究》，11（1）（2004），頁 79-117。林玉茹，〈殖民地邊區的企業：日治時期東臺灣的會社及企業家〉，《臺大歷史學報》，33（2004），頁 315-563。陳家豪，〈日治時期在臺日資與民營鐵道業之改革〉，《臺灣學研究》，16（2013），頁 101-150。

期刊論文，主要將以中、大型企業會社菁英作為研究對象，探討在臺日人如何透過社會網絡與家族血緣發展產業。⁴ 2017 年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出版《和風吹撫的港市：打造高雄日人的故事》，書中選介 8 位對日治時期高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的日本人物，其中實業家包括淺野總一郎、古賀三千人、大坪與一、佐佐木紀綱與吉井長平等人。⁵ 該書以通俗而平易的敘述方式，從人物生平與事業發展切入，說明其與高雄地方建設、產業發展及城市形成之關聯，對於一般讀者理解日治時期高雄日本實業家的活動樣貌，具有良好的入門性與普及意義。此書雖偏重人物故事的引介與地方歷史的普及書寫，較少深入探討其商業經營結構、資本運作模式及個別商號的實際發展軌跡，但仍提供了觀察日治時期高雄日人經濟活動的重要線索，也反映出目前相關研究多聚焦於影響城市發展的代表性人物，對於中小規模日人獨資商號的經營實態，尚有進一步開展的空間。

因此本文試圖以高雄地區的獨資商號「山形屋」（やまかたや）為例，重建獨資商號在高雄活動的軌跡與樣貌。「山形屋」是由在臺日商山田耕作所開設的獨資商號。目前關於山田耕作的既有研究，可見蔡侑樺、徐明福以總督府公文類纂〈山田耕作官有原野豫約賣渡願許可〉相關書類為核心史料，探討其於 1916 年至 1919 年間在鳳山南麓，即今小港區鳳鳴里一帶的開墾情形。該文主要依據公文內容及其附件，詳細分析山田耕作申請開墾前的當地地貌、開墾計畫內容及其實際結果，並進一步嘗試說明此一開墾經驗與其日後於同地區從事生石灰製造販售及石材開採事業之間的可能關聯。不過，受限於史料證據，該文尚未能就兩者之間建立明確的因果聯繫。⁶ 整體而言，此研究主要聚焦於山田耕作在特定區域的土地開墾活動，對其來臺後的發展歷程、商業經營網絡及其他經濟活動則較少著墨。是故，若欲進一步掌握山田耕作在日治時期高雄的整體經營軌跡，仍有必要從更廣泛的商業活動與商號經營層面進行補充與深化。

4 趙祐志，〈日人在臺企業菁英的社會網絡（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趙祐志，〈在臺日人菁英之家族觀與企業的繼承（1895-1945）——以 126 個繼承事例為例〉，《臺北文獻》（直字），159（2007），頁 33-89。趙祐志，〈地緣網絡與在臺日人企業的經營（1895-1945）——以近江商事等十二個鄉土閥企業為例〉，《國際文化研究》，5（1）（2009），頁 51-99。趙祐志，〈日治時期在臺日人企業菁英的家閥與企業經營——以 107 個兄弟、伯叔侄關係為例〉，《重高學報》，13（2010），頁 89-119。趙祐志，〈日治時期日人在臺退職官吏與臺灣青果會社及青果同業組合的運作〉，《重高學報》，8（2005），頁 119-142。

5 王御風、杉森藍、吳孟青、黃于津、許聖迪，〈和風吹撫的港市：打造高雄日人的故事〉（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17）。

6 蔡侑樺、徐明福，〈從公文檔案〈山田耕作官有原野豫約賣渡願許可〉書類談日治中期以後鳳山南麓之墾殖〉，《高雄文獻》，1（2）（2011），頁 122-143。

貳、山田耕作的生涯轉折與初期立足

山田耕作原籍貫為愛知縣東加茂郡（位於今愛知縣豐田市），⁷ 父親山田佐七是一介平民。山田耕作出生於明治 13 年（1880），是家中的長男，除了他，家裡還有一對姊妹以及養子、養女各 1 名，他在來臺灣之前曾投身海軍。⁸

自 1895 年臺灣總督府正式展開對臺灣的殖民統治開始，便向日本國內徵聘各種公職人員，而 1896 年 3 月臺灣總督府廢除軍政改行民政後開放日人自由渡臺，更形成一股渡臺淘金熱。⁹ 在日俄戰爭後，明治 39 年（1906）又產生新一波的渡臺熱潮，此時的日本通過日俄戰爭確立在亞洲的國際地位，臺灣總督府對臺的重要基礎建設亦陸續完成，帶動日本資本家來臺投資的意願，來臺日人人數激增。¹⁰ 在此一背景下，山田耕作結束其軍旅生涯後，選擇渡海來臺，尋找新的機會。

1906 年 5 月，山田耕作通過臺灣總督府普通文官試驗，¹¹ 翌年（1907）獲分發為總督府殖產局局長專屬，正式進入殖產行政體系。¹² 其後，山田於明治 41 年（1908）轉任臺北廳芝蘭一堡福德洋庄的園藝試驗場服務，即今士林官邸一帶。¹³ 園藝試驗場為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推動園藝產業的重要機構，係於 1907 年 12 月決定設置，並於 1908 年 1 月由總督府選定臺北廳下福德洋庄山仔腳官有地，依訓令第 5 號設立「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園藝試驗場」，¹⁴ 由農商課技師芳賀楸五郎擔任主任，山田耕作等人

7 愛知縣政府官方網站，資料檢索日期：2026 年 1 月 26 日。網址：<http://www.pref.aichi.jp/global/ch/summary/profile/overview.html>。

8 「山田耕作官有原野豫約賣渡願許可」（1919 年 9 月 1 日），〈大正八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三十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940006。

9 王慧瑜，〈日治時期臺北地區日本人的物質生活（1895-1937）〉（臺北：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頁 15。

10 同上註，頁 16。

11 「文官普通試驗合格者」（1906 年 5 月 22 日），〈明治 39 年 5 月臺灣總督府報第 1971 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11971a011。

12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明治 40 年）（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07），頁 29；收藏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13 蔡侑樺、徐明福的文章根據總督府公文類纂中〈山田耕作官有原野豫約賣渡願許可〉檔案裡臺南廳長上呈總督府的公文，認為山田耕作任職的地方為總督府殖產局恆春熱帶植物殖育場。但於《恆春熱帶植物殖育場事業報告事歷部》中並無山田耕作的服務紀錄，且明治 41 年《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的紀錄中，山田耕作為臺北廳芝蘭一堡福德洋庄的園藝試驗場，因此本文採信《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的紀錄。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明治 41 年 4 月）（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07），頁 38；收藏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14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台灣總督府園芸試驗場一覽》（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16），頁 2-3。

則任兼屬。該試驗場主要從事柑橘、蔬菜及花卉等園藝植物之試種與品種改良工作。¹⁵ 由此可見，山田耕作來臺初期係從殖產行政與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出發，其職務經歷不僅反映出總督府積極推動農業改良與殖產開發的政策方向，也為其日後轉向民間經營與地方產業活動奠定了初步基礎。

然而，山田耕作於園藝試驗場任職未久，便向臺灣總督府報稱自身難以適應臺灣的氣候環境。據其陳述，抵臺不久後即罹患麻刺利亞，並併發腳氣病，身體狀況因而持續惡化。¹⁶ 此二疾病皆為日治初期來臺日本人較常見的健康問題，亦反映出殖民地環境對移居者身體適應所帶來的挑戰。其中所謂「麻刺利亞」，即瘧疾（*malaria*）的日文音譯，主要透過受感染的雌性瘧蚊叮咬而傳播。¹⁷ 臺灣氣候溫暖潮濕、雨量充沛，適合蚊蟲孳生，因此以蚊蟲為媒介的傳染病相當盛行。臺灣總督府於 1899 年設置地方傳染病調查委員會，針對相關疫情進行詳細調查與記錄。¹⁸ 根據 1906 年的調查顯示，瘧疾高居當時死因之首，每年死於瘧疾者少則數千人，多時更高達萬餘人。¹⁹ 至於腳氣病，則是一種主要因缺乏維生素 B1 所引起的營養性疾病，常伴隨末梢神經障礙及心臟功能不全等症狀。²⁰ 值得注意的是，腳氣病在臺灣本地居民之間並不常見，卻普遍見於來臺日本移居者，此一現象貫穿整個日治時期。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內科教室副教授佐藤八郎曾整理臺灣腳氣病相關統計，指出 1905 年至 1938 年間，臺內地人的腳氣病死亡率約為 2.08% 至 7.69%，相較之下，臺灣人僅為 0.24% 至 0.89%。²¹ 由此可見，山田耕作罹患瘧疾與腳氣病，並非單一個人偶發的不幸，而是當時日本移居者在臺生活中相當典型的疾病經驗。

由於腳氣病始終未能痊癒，山田耕作最終請辭臺灣總督府職務；醫師並建議其返回日本內地休養治療四、五個月。²² 經過一段時間的療養後，山田耕作再度來臺，於明治 42

15 吳明勇，〈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附屬園藝試驗場之建立〉，《臺灣學通訊》，80（2014），頁 10-12。

16 「山田耕作賞與、依願免及退官賜金」（1908 年 12 月 16 日），〈明治四十一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判）第十二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445045。

17 朱耀沂，〈臺灣昆蟲學史話（1684～194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頁 166-168。

18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編，〈マラリア防遏誌〉（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1932）。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資料檢索日期：2026 年 4 月 20 日。網址：<https://dl.ndl.go.jp/pid/1146541>。

19 許峰源，〈戰後初期臺灣地區的瘧疾防治（1945-1952）〉，《臺灣學研究》，20（2016），頁 76。

20 張秀蓉編註，〈日治臺灣醫療公衛五十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頁 275-277。

21 松田利彥，〈帝國日本與腳氣病研究——以臺北醫院醫長稻垣長次郎為中心〉，《師大臺灣史學報》，16-17（2024），頁 14-15。

22 「山田耕作賞與、依願免及退官賜金」，《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檔號 00001445045。

年(1909)1月進入三美路商會(サミュエル商會, Samuel Samuel & Co., Ltd.)臺北支店任職,由官廳體系轉向民間商業部門,開啟另一階段的職涯歷程。²³三美路商會創立於1834年的倫敦,原先經營古董與藝術品買賣,其後受英國自由貿易政策影響,積極向海外拓展市場。至1878年, Marcus Samuel 於日本橫濱設立支店,開始從事進出口貿易。²⁴日本領臺後,三美路商會亦積極介入臺灣市場,並於1899年取得臺灣樟腦的獨占販賣權,至1907年為止。²⁵除樟腦業務外,該商會亦涉足石油販售與紅磚製造等產業,持續擴張在臺事業版圖。

1897年8月三美路商會為發展臺灣業務,向辜顯榮永久租用大稻埕城隍廟前街土地,設立臺北支店,並聘請荒井泰治來臺擔任支店長。²⁶1900年至1908年間,三美路商會憑藉對臺灣樟腦市場經銷權的掌握,獲利甚豐。同時,該商會亦廣泛承攬官方採購與代理業務。例如臺灣鐵道部購買機器及訂購外國物品時,三美路常與怡和洋行、三井、高田、大倉、橫山等商號共同投標,成為鐵道部所倚重的「官用六商人」之一;土木部亦曾委託其代購自動地下水探知器。²⁷山田耕作轉入三美路商會任職,正是在此一兼具跨國資本、殖民地市場優勢與官廳業務網絡的商業環境中展開新階段的歷練,對其日後投入個人經營活動具有一定啟發與影響。

隨著明治41年(1908)臺灣縱貫鐵路全線通車,南部所生產的米、糖與阿里山木材等大量物資,逐漸集中於打狗港等待輸出,使港口運輸與裝卸需求迅速增加。²⁸面對此一情勢,臺灣總督府遂正視打狗港擴建的迫切性,於同年3月獲帝國議會同意推動築港計畫,並以每年吞吐貨物453,500噸為目標,正式展開打狗港第一期築港工程。築港事業的啟動,使打狗成為當時南臺灣重大建設集中的核心區域;同年鳳山廳亦發布第一次「打狗市區改正計畫」,進一步帶動當地公共建設與市街發展。²⁹在此背景下,三美

23 鈴木常良,《臺灣商工便覽》(第二版)(臺中:臺灣新聞社,1919),頁90。

24 山内昌斗,〈英国サミュエル商会のグローバル展開と日本〉,《広島経済大学経済研究論集》,29(4)(2007),頁114-118。

25 同上註,頁118。

26 翁靖傑,〈日治時期臺灣近代建築建築材料紅磚的使用之研究——以商標作為建築編年的初步探討〉(桃園:中原大學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頁39-46。

27 鍾淑敏,〈英商三美路商會(Samuel Samuel & Co., Ltd.)與日治前期臺灣的產業發展〉,《臺灣史研究》,25(2)(2018),頁116-117。

28 臺灣總督府土木局,《打狗築港》(臺北:臺灣總督府土木局,1920),頁5。

29 謝瀆澤,〈從打狗到高雄——日治時期高雄港的興築與管理(1895-1945)〉,《臺灣文獻》,62(2)(2011),頁218。

路商會亦積極掌握打狗地區因港灣建設與產業運輸所帶來的商機。該商會承攬南部製糖會社專用鐵道所使用的輕便軌道，³⁰ 後續亦承接阿里山鐵道軌道之輸入業務。³¹ 隨著在打狗的業務逐步擴大，三美路商會遂於當地設立出張所，以因應南部市場的發展需求。至明治 44 年（1911），山田耕作即被派駐打狗，擔任三美路商會打狗出張所職員。³²

參、山田耕作的投資活動與資產累積

1911 年山田耕作轉任三美路商會打狗出張所職員之際，打狗港第一期築港工程已告完成；同時，在「打狗市區改正計畫」的推動下，打狗市街亦逐漸呈現現代都市的雛形。此一時期，打狗停車場、商會，以及臺灣製糖、大阪商船、三井物產會社等機構與企業事務所相繼設立，顯示打狗已成為南臺灣交通、貿易與產業活動的重要節點。³³ 另一方面，鐵道運輸與港灣碼頭的相互配合，也加速了人口與商品的流動，帶動旅館、運輸及相關服務業陸續進駐新填築市街，形成相當活絡的商業景象。³⁴ 山田耕作身處打狗港與新興市街快速發展的現場，應當得以直接感受到當地日益擴張的商業機會。或許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與市場前景吸引下，山田耕作於大正元年（1912）選擇離開三美路商會，轉而投入個人事業經營，開啟其在打狗獨立發展的新階段。³⁵

山田耕作離開三美路商會後，開始以較多元的方式展開個人經營與投資活動。首先，他以 67.5 圓為資本，³⁶ 在當時甫完成填築的新市街租用一棟木造建築經營販賣業，販售品項包括鞋類、玩具、節慶人偶、化妝品、小物、新刊書籍與雜誌等。³⁷ 由其營業內容觀之，山田耕作的經營並非單一專門商品，而是回應新興市街居民日常生活與消費

30 〈ベンチャー號の軌道〉，《臺灣日日新報》第 3420 號（1909 年 9 月 21 日），第 3 版。

31 〈打狗雜信（一日） 露船入港〉，《臺灣日日新報》第 4433 號（1912 年 10 月 3 日），第 2 版。

32 臺灣大觀社編，《最近的南部臺灣》（臺南：臺灣大觀社，1923），頁 59。

33 張守真，《哈瑪星的前世今生》（高雄：哈瑪星社區營造工作室，1998），頁 17。

34 打狗港第一期築港工程中，在第一碼頭後方填築面積約七萬坪的區域做為市街發展的預定地（今哈瑪星地區）。謝瀟澤，〈從打狗到高雄——日治時期高雄港的興築與管理（1895-1945）〉，頁 219。

35 鈴木常良，《臺灣商工便覽》（第二版），頁 90。

36 臺灣大觀社編，《最近的南部臺灣》，頁 59。

37 「山田耕作官有原野預約賣渡願許可」（1919 年 9 月 1 日），〈大正八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三十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940006。

需求的綜合性零售業務，顯示其已開始掌握打狗都市發展下所形成的市場機會。

另一方面，山田耕作亦將投資觸角延伸至官有原野的開墾事業，租用官有原野並聘請本島人從事開墾工作，種植相思樹與桂竹等具經濟價值之作物。³⁸ 其中，相思樹自清代咸豐、同治年間以來即為重要的木炭原料，且因材質優良，日治初期相思炭價格居各類木炭之首；³⁹ 桂竹則用途廣泛，竹葉可供製作斗笠與特殊包裝材料，竹桿可用於建築、籬笆、器具製作及劈篾編物，竹枝可製掃帚，竹筍除可食用外，亦可加工製成筍乾保存。由此可見，山田耕作所投入的開墾事業，並非單純土地利用，而是著眼於林產與竹材資源的市場價值。

此外，山田耕作之所以得以投入官有原野開發，也與總督府相關政策密切相關。自明治 29 年（1896）起，臺灣總督府即陸續頒布法規，對官有森林原野的經營與開發進行管理與獎勵；其後又於明治 43 年至大正 3 年（1910-1914）間實施林野調查，以進一步掌握臺灣山林資源的分布與利用狀況。⁴⁰ 在此政策背景下，官有林野的開發遂吸引包括山田耕作在內的內地人與本島人積極參與。值得注意的是，山田耕作之所以選擇投入此類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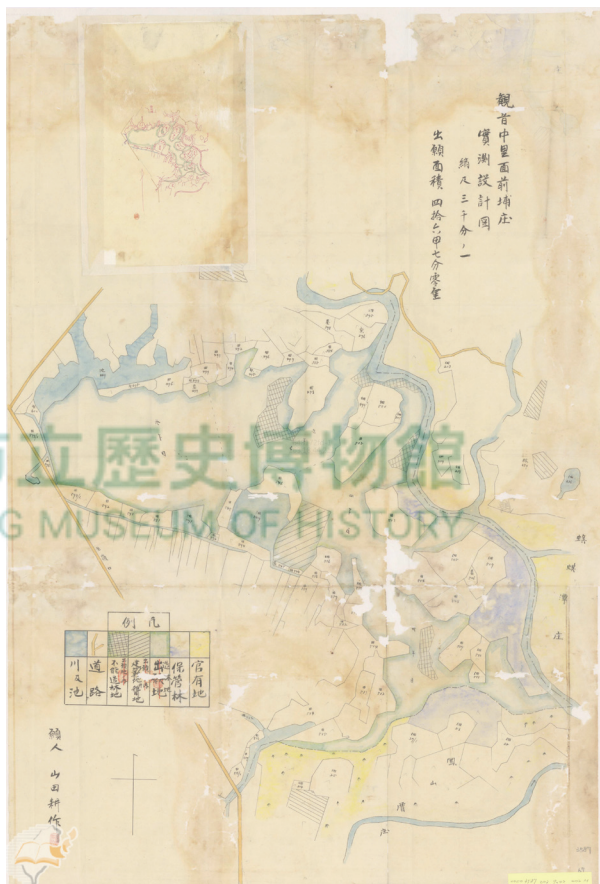


圖 1 山田耕作所租用位於今燕巢區面前埔官有林地位置圖

圖片來源：「山田耕作豫約賣渡許可地事業程度屆」（1923 年 1 月 1 日），〈大正十二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三十七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3587003。

38 「山田耕作豫約賣渡許可地事業程度屆」（1923 年 1 月 1 日），〈大正十二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三十七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3587003。

39 曾品滄，〈炎起爨下薪——清代臺灣的燃料利用與燃料產業發展〉，《臺灣史研究》，15（2）（2008），頁 45。

40 李文良，〈日治初期臺灣林野經營之展開過程——以大料坎（桃園大溪）地區為中心〉，《臺灣史研究》，3（1）（1996），頁 155-157。

墾事業，或亦與其早年在殖產局園藝試驗場的任職經驗有關。從申請文件內容來看，官方亦因其曾具相關職務歷練，而對其開墾能力抱持一定信任。⁴¹ 對山田而言，開墾官有原野不僅是其離開受僱體系後的重要投資方向，也反映其逐步透過零售經營與土地開發並行的方式，累積在打狗地區立足所需的經濟基礎。

當零售經營與官有原野開墾兩項事業逐漸步上軌道後，山田耕作的資產亦隨之擴張。其後，他進一步出資購買原先所開墾之土地，成為臺南廳鳳山下里中林仔庄（今高雄市小港區）、小竹下里王公廟庄苦苓腳（今高雄市林園區），以及觀音中里面前埔庄（今高雄市燕巢區）三地擁有近百甲土地的地主。與此同時，山田耕作亦將原先租用作為營業場所的房舍買下，並加以改建，作為「山形屋」商店之用。⁴² 由此可見，「山形屋」的出現，並非單純的店鋪設立，而是山田耕作在零售經營與土地投資逐步累積資本之後，進一步將經濟成果轉化為固定店址與商號經營的重要起點。

除了積極投入個人事業經營之外，山田耕作亦逐步參與打狗地區的社團組織與公共事務。大正 2 年（1913），由楠田金之丞發起、集結一百七十名日籍人士籌組的「打狗信用組合」獲准成立，成為 1913 年《產業組合法》施行後打狗地區首批成立的信用組合之一。⁴³ 山田耕作亦參與其間，並認購五份口數，成為正式會員。⁴⁴ 此舉顯示他不僅在經濟活動上逐漸站穩腳步，也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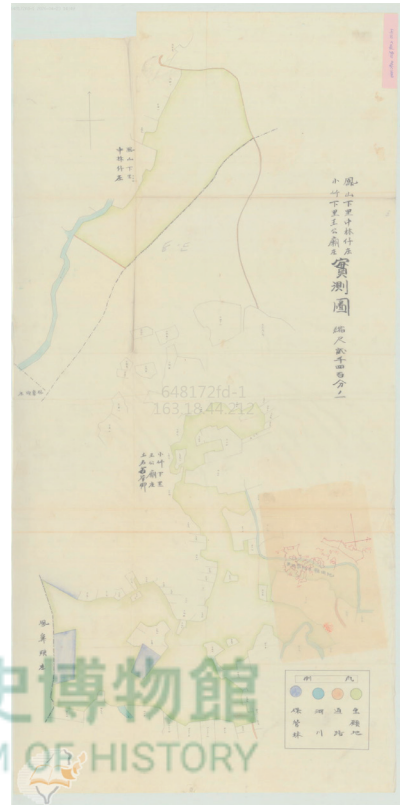


圖 2 山田耕作所租用位於今林園區官有林地位置圖

圖片來源：「山田耕作官有原野豫約賣渡願許可」（1919 年 9 月 1 日），〈大正八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三十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940006。

41 「山田耕作官有原野豫約賣渡願許可」（1919 年 9 月 1 日），〈大正八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三十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940006。

42 臺灣大觀社編，《最近の南部臺灣》，頁 59。

43 郭婷玉，〈日本時代臺灣地方信用組合的運作與發展：以高雄中洲、興業信用組合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21），頁 87。

44 「有限責任打狗信用組合設立申請許可（楠田金之丞外百七十名）」（1913 年 12 月 1 日），〈大正二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六十五卷財務〉，《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149009。

始透過地方金融與互助組織，建立其在日人社會中的人脈與地位。其後，當大正 7 年（1918）花蓮港發生重大火災時，山田耕作亦以「山形屋」名義，與築中陶器店、ダルマ屋吳服店、吉井雜貨店等商家共同發起義賣義捐活動。⁴⁵ 此一行動不僅展現其作為地方商人的社會責任，也有助於形塑「山形屋」在地方社會中的良好形象。再者，山田耕作其後並參與高雄商工會的創設，投入相關計畫與會務運作，且曾擔任商工會評議員。⁴⁶ 山田耕作的活動範圍並不侷限於個人資產累積與商號經營，而是進一步延伸至地方社會網絡與公共事務參與，反映其已逐漸由一般經營者轉化為具有一定地方影響力的商人。

昭和 6 年（1931），高雄港第二期築港工程新建碼頭倉庫完工，高雄州最高行政機關高雄州廳新廈亦告落成。為彰顯政府對高雄地區的投資成果，以及築港以來港勢發展與產業振興的成效，官方特別舉辦「高雄港勢展覽會」作為宣傳。⁴⁷ 山田耕作亦捐助展覽會經費二十餘圓，並擔任正會員，顯示其已不僅是地方商業活動的參與者，更成為官方公共活動的重要支持者之一。⁴⁸ 其後，山田耕作更憑藉過往的經營與實務經歷，受延攬出任資本額十萬日圓之日本興業株式會社社長。該會社設於高雄州鳳山郡鳳山街，主要從事生石灰製造販賣與石材採取販賣。⁴⁹ 此一職務變化，反映山田耕作已由早期打狗新興市街中的個別商人，進一步擴展至地方產業經營與企業領導層面，其經濟活動與社會影響力亦隨之提升。

肆、山形屋之經營型態與商品結構

在山田耕作所經營的諸項事業中，「山形屋」不僅是其主要收入來源之一，⁵⁰ 也可視為目前所知高雄地區出現最早的書店。⁵¹ 因此，以下將以「山形屋」為中心，進一步

45 〈打狗 義捐賣出し〉，《臺灣日日新報》第 6597 號（1918 年 11 月 1 日），第 6 版。

46 芝中一，《新興の高雄》（高雄：臺南新報發行所，1930），頁 194。

47 謝濤澤，〈國家與港口發展——高雄港的建構與管理（1895-1975）〉（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 113。

48 高雄港勢展覽會編，《高雄港勢展覽會誌》（高雄：高雄港勢展覽會，1931），頁 7。

49 〈日本興業會社 鳳山に創立〉，《臺灣日日新報》第 11927 號（1933 年 6 月 20 日），第 5 版。

50 「山田耕作豫約賣渡許可地事業程度屆」（1923 年 1 月 1 日），〈大正十二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三十七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3587003。

51 陳坤毅，〈[時光] 一張老照片看高雄第一間書店的故事〉，三餘書店官方網站（2017 年 5 月 12 日）。資料檢索日期：2026 年 4 月 20 日。網址：https://takaobooks.tw/html/magazine_info?me_guid=e84fc5deb26c。



圖 3 明信片「臺灣高雄驛前通」中的山形屋
圖片來源：〈「臺灣高雄驛前通」明信片〉，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資料，登錄號：KH2022.019.0018。



圖 4 山形屋現況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分析山田耕作的商業經營型態與商品結構。

「山形屋」之命名原因，推測應與其店鋪建築樣貌有關。日文中「山形」（やまかた）一詞，除了作為地名「山形縣」之外，通常用以形容中間高、兩側低、狀似山峰的外觀形式。⁵²在日本本土，以「山形屋」作為商店名稱者頗為常見，例如明治 35 年（1902）出版的《日本商工營業錄》中，即可見從事白米零售、鼻緒爪掛批發、琴三味線買賣、吳服太物零售等不同業種之商號，皆以「山形屋」為名。⁵³由此可知，「山形屋」在日本商業命名慣例中，本即為常見商號名稱之一。

山田耕作所經營的「山形屋」位於十字路口的街角地帶，即臺灣俗稱的「三角窗」位置，其建築外觀又以街角為中心，屋頂或立面呈現由中央向兩側遞降的階梯式樣貌，⁵⁴整體形制近似「山形」。因此，若就其空間位置與建築形式觀之，「山形屋」之名稱很可能正是取自店鋪本身鮮明的建築特色，藉以強化顧客對商店外觀與位置的辨識，並形成具有記憶點的商號形象。

就目前所見史料而言，尚無法確知「山形屋」建築的確切興建時間。不過，現存資料中最早出現「山形屋」一詞者，應見於大正 7 年（1918）出版的《臺灣商工便覽》（第

52 松村明編，《大辞林（第三版）》（東京：三省堂，2006）。

53 井出徳太郎編，《日本商工營業錄》明治 35 年 9 月刊（訂正 3 版）（東京：日本商工營業錄發行所，1898-1902）。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資料檢索日期：2026 年 4 月 20 日。網址：<https://dl.ndl.go.jp/pid/803749>。

54 請參見圖 4。

一版)》，該書在〈各種卸小賣商〉中將其歸類為玩具店，並將店主姓名誤植為「山形ナカ」。⁵⁵由於該版內容訛誤頗多，隔年刊行的《臺灣商工便覽（第二版）》已作修正，並於〈人名要鑑〉中直接稱山田耕作為「山形屋商店主」。⁵⁶由此可見，至少至 1918 年前後，「山形屋」已成為山田耕作商號的正式名稱。

若再結合打狗市街發展脈絡與其他相關史料觀之，則或可進一步推估其建築形成的時間。山形屋位於當時打狗車站（今打狗鐵道故事館）前主幹道旁，其所在地新濱町，係由臺灣地所建物株式會社主持開發，並由淺野總一郎⁵⁷於明治 40 年（1907）取得特許營造，至 1912 年完成約 2,240 坪的填築地。⁵⁸換言之，山田耕作的店鋪所在，本即位於打狗新興市街開發完成後的重要街區之中。

此外，大正 9 年（1920）山田耕作為申請取得開墾土地，向臺灣總督府提報資產調查書時，曾將其家屋記載為「打狗新濱町 123 番地驛前木造一棟」，顯示其當時的店舍仍為木造建築。⁵⁹另一方面，《最近の南部臺灣》在介紹山田耕作時提到，其「明治 45 年 12 月辭職後來到高雄街定居……最近店鋪新落成且營業項目更新」，則可知至大正 12 年（1923）時，山田耕作的店鋪應已完成改建，並以新面貌繼續營業。⁶⁰根據建物登記資料，山田耕作於大正 11 年（1922）年 5 月 5 日取得山形屋建物，大正 15 年（1926）年 1 月 26 日辦理建物登記，建材以煉瓦造（磚造）為主，並有一附屬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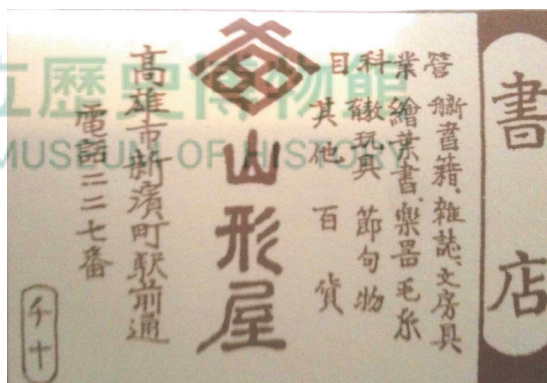


圖 5 〈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中對山形屋的介紹

圖片來源：木谷佐一，〈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 臺灣地方 NO.180 高雄市〉（東京：東京交通社，1929；臺北：南天書局 2008 年復刻）。

55 臺灣新聞社，〈臺灣商工便覽〉（第一版）（臺中：臺灣新聞社，1918），頁 197。

56 鈴木常良，〈臺灣商工便覽〉（第二版），頁 90。

57 淺野總一郎，富山縣氷見市人，日本實業家，淺野水泥、淺野財閥創辦人。關於淺野總一郎事蹟請參見：王御風，〈從淺野到臺泥：臺灣第一的水泥廠〉（新北：我已文創，2019）。

58 張守真，〈哈瑪星的前世今生〉，頁 17。

59 「山田耕作豫約賣渡許可地事業程度屆」（1923 年 1 月 1 日），〈大正十二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三十七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3587003。

60 臺灣大觀社編，〈最近の南部臺灣〉，頁 59。

為木造。⁶¹ 這《最近の南部臺灣》一文之敘述時間相符，因此可推斷山形屋建物確實興建於大正 11 年（1922）年。

就營業內容而言，山形屋主要販售新刊書籍、雜誌、文具、明信片、樂器、毛織品、教育玩具、節慶用具及其他百貨。⁶² 由此可見，山形屋雖以「書店」為名，實際上其販售商品種類相當多元，經營型態並不限於單純書籍買賣，而較接近兼營文具、雜貨與日常用品的綜合性零售商店。此一經營型態，或可與山形屋所處的地理位置及消費環境一併理解。根據相關研究，明治 37 年（1904）打狗地區日本人僅占總人口的 15.2%，但隨著打狗築港工程推動及新興市街開發，日本人口比例至 1918 年已上升至 46.7%。⁶³ 山形屋所在的新濱町一丁目，正是此一時期新填築完成的重要街區；新濱町及鄰近的湊町，不僅為當時高雄的行政中心，高雄警察署、高雄郵局、高雄市役所等政府機構均設於此，市役所官舍、州官舍與鐵道驛官舍亦集中於區域內，形成日人聚居與活動頻繁的生活空間。

此外，高雄地區第一所供日人子弟就讀的高雄第一尋常小學校，於大正元年遷入湊町四丁目五番地；高雄最早的現代化市場「湊町市場」亦設於此區。⁶⁴ 由於周邊聚集人群多以在臺日人為主，附近街區亦多為日人經營的和服店與各式商店，顯示山形屋所面對的主要消費客群，應即為居住於高雄新興市街中的日本人社群。從這一點來看，山形屋商品結構的多樣性，正是對此一特定消費群體日常生活、教育文化與節慶需求的回應。也因此，在山形屋的營業項目中，除了書籍、文具與教育玩具等商品之外，尚包含具有文化意涵的「節慶用具」。此類商品的存在，顯示山形屋不僅供應在臺日人的日常消費所需，也承載其節慶生活與文化再現的需求，反映出殖民地日人社群如何透過商業空間延續原有的生活方式與文化習慣。

此外，隨著觀光旅遊風氣日漸盛行，以及官方有意識地宣傳高雄港建設成果，「繪葉書」作為兼具紀念與展示功能的風景明信片，逐漸成為當時重要的觀光休閒商品之

61 鹽埕地政事務所，〈高雄市鼓山區鼓南段一小段 81 號〉，《日治時期建物登記簿》。

62 木谷佐一，〈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 臺灣地方 NO.180 高雄市〉（東京：東京交通社，1929；南天書局 2008 年復刻）。

63 蔡佩蓉，〈壽山·誰的臺灣意象？日治時期公共空間的文化意涵之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頁 54-55。

64 楊玉姿、張守真，〈哈瑪星的文化故事〉（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04），頁 6。

一。⁶⁵ 高雄車站每年匯集大量商旅人潮與龐大貨物流通，帶動站前新濱町一丁目形成繁盛的商業空間，銀行、運送店、旅館、料理店與各類零售商店林立，提供了可觀的消費市場。⁶⁶ 位處高雄車站前的山形屋，正是憑藉此一地利之便，在店內販售繪葉書予往來旅客，並進一步自行發行印製繪葉書，展現出其敏銳掌握市場趨勢的經營策略。

就目前留存的山形屋發行繪葉書內容來看，其題材多取自高雄街道風景、官舍建築與港口意象，反映出當時高雄作為新興港灣都市的代表景觀。不過，山形屋所發行者並不限於高雄地方景觀，亦包括以臺灣風俗為題材的系列繪葉書。此種主題選擇，一方面呼應了當時旅遊紀念品市場對地方景觀與異文化風俗的偏好，另一方面也顯示山形屋在商品規劃上具有相當程度的靈活性，能夠依據消費者需求調整販售內容。

除此之外，山形屋亦善於透過廣告宣傳提升商號知名度與商品銷售。例如在片山清夫編著的《大高雄建設論と市の現勢》一書背後廣告頁中，即可見山



圖 6 山形屋所發行的明信片〈舊城城址〉

圖片來源：〈高雄左營舊城東門（鳳儀門）〉，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資料，登錄號：KH2017.019.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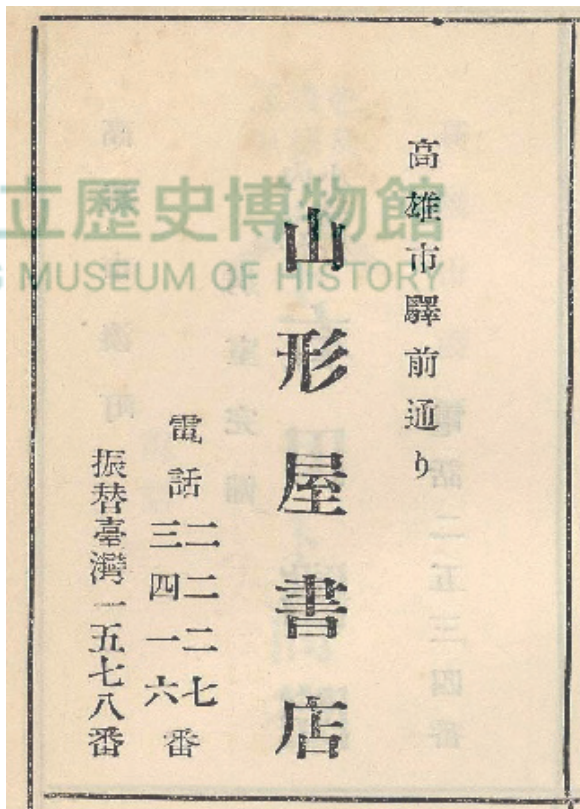


圖 7 刊登於《大高雄建設論と市の現勢》的山形屋廣告

圖片來源：片山清夫編，《大高雄建設論と市の現勢》（高雄：南海時報社高雄支局，1936），版權頁 11。

65 謝瀟澤，〈國家與港口發展——高雄港的建構與管理（1895-1975）〉，頁 109-117。

66 李文環、蔡侑樺、黃于津、蔡佩蓉、余健源，《高雄港都首部曲：哈瑪星》（臺中：好讀，2015），頁 128。

形屋書店的廣告；⁶⁷而昭和 5 年（1930）發行的〈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 臺灣地方 NO.180 高雄市〉，亦清楚標示山形屋的位置、電話號碼與營業項目，並附有店鋪照片以供辨識。⁶⁸由此可見，山形屋不僅在商品內容上順應高雄城市發展與觀光消費潮流，也透過積極的廣告與媒體曝光，持續鞏固其在高雄新興市街中的商業存在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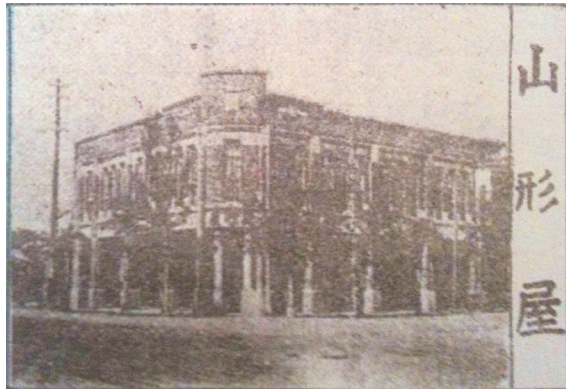


圖 8 〈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中山形屋的影像
圖片來源：木谷佐一，〈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 臺灣地方 NO.180 高雄市〉。

伍、結論

本文以山田耕作與其經營之「山形屋」為中心，探討日治時期高雄日人獨資商號的經營軌跡，並藉此補充既有研究多偏重大型在臺日資、財閥企業及代表性實業家的不足。透過山田耕作的個案可以看出，在殖民地高雄的城市發展過程中，除大型資本與官方主導的建設力量外，尚有一批規模較小但具高度彈性的日人獨資商號，構成地方商業運作的重要基層。

山田耕作來臺後，原先進入總督府殖產行政體系，後因疾病因素退出官廳職場，轉入三美路商會任職，並隨其業務南下打狗。其後又把握打狗築港、市區改正及新濱町開發所帶來的商業契機，由受僱職員轉為獨立經營者。此一歷程顯示，日人獨資商號的形成，往往與殖民地城市建設、人口聚集及交通節點的發展緊密相關，而其經營者亦須在政策環境與市場變動之間，尋求適合自身規模的生存與發展空間。

就經營策略而言，山田耕作並非依靠單一事業立足，而是採取零售經營與官有原野開墾並行的方式，逐步累積資產，進而取得土地與固定店址，完成「山形屋」的改建。

67 片山清夫編，〈大高雄建設論と市の現勢〉（高雄：南海時報社高雄支局，1936），版權頁 11。

68 木谷佐一，〈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 臺灣地方 NO.180 高雄市〉（東京：東京交通社，1929；南天書局 2008 年復刻）。

此一發展過程反映出中小規模日人商號在殖民地臺灣的經營特徵：一方面難以與大型會社競逐國家主導的重要產業與建設，另一方面則善於利用總督府的開發政策、地方市場需求與個人經驗，在較小尺度的零售、土地投資與資源開發中建立經濟基礎。

作為山田耕作事業的核心，「山形屋」雖以書店為名，實際上卻是一間兼營書籍、文具、明信片、教育玩具、節慶用具及百貨的綜合性零售商店。其商品結構與經營型態，與新濱町及湊町一帶日人聚居、官署集中、學校與市場並立的空間條件密切相關。換言之，山形屋的經營並非單純反映個別商人的選擇，更呈現出殖民地高雄日人社群的生活需求、文化消費與商業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尤其節慶用具、教育玩具與繪葉書等商品，既服務於日常生活，也承載了文化延續、觀光消費與地方意象再現等多重功能。

此外，山田耕作並未將活動侷限於個人營利，而是透過參與信用組合、商工會、義賣義捐與官方展覽等公共事務，逐步累積地方社會中的聲望與網絡。由此可見，日人獨資商號的經營不僅是經濟活動，同時也是商業信用、社會形象與地方關係持續建構的過程。山田耕作後來受延攬出任日本興業株式會社社長，正可視為其由地方商號經營者進一步跨入產業經營層次的具體表現。

總體而言，山田耕作與山形屋的個案顯示，日治時期高雄日人獨資商號的發展，乃是建立在殖民地都市建設、人口結構變動與地方消費市場形成的基礎之上。這類商號雖不若大型資本顯赫，卻憑藉多角化經營、靈活調整商品結構、掌握特定社群需求及積極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在高雄新興港灣都市的形成過程中扮演了不可忽視的角色。山形屋因此不僅是山田耕作個人經營史的核心，也是一個足以反映日治時期高雄地方商業、殖民地社會與消費文化交會樣貌的重要個案。



參考書目／

一、史料

- 〈ベシヤワー號の軌道〉（1909 年 9 月 21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3420 號，第 3 版。
- 〈日本興業會社 鳳山に創立〉（1933 年 6 月 20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11927 號，第 5 版。
- 〈打狗 義捐賣出し〉（1918 年 11 月 1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6597 號，第 6 版。
- 〈打狗雜信（一日） 露船入港〉（1912 年 10 月 3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4433 號，第 2 版。
- 「山田耕作官有原野豫約賣渡願許可」（1919 年 9 月 1 日），〈大正八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三十卷地方〉，
《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940006。
- 「山田耕作賞與、依願免及退官賜金」（1908 年 12 月 16 日），〈明治四十一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判）第十二卷秘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445045。
- 「山田耕作豫約賣渡許可地事業程度屆」（1923 年 1 月 1 日），〈大正十二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三十七卷地方〉，《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3587003。
- 「文官普通試驗合格者」（1906 年 5 月 22 日），〈明治 39 年 5 月臺灣總督府報第 1971 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11971a011。
- 「有限責任打狗信用組合設立申請許可（楠田金之丞外百七十名）」（1913 年 12 月 1 日），〈大正二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六十五卷財務〉，《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149009。
- 井出徳太郎編（1989-1902），《日本商工營業錄》明治 35 年 9 月刊（訂正 3 版）。東京：日本商工營業錄發行所。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資料檢索日期：2026 年 4 月 20 日。網址：<https://dl.ndl.go.jp/pid/803749>。
- 木谷佐一（2008〔1929〕），〈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 臺灣地方 NO.180 高雄市〉。東京：東京交通社；臺北：南天書局復刻。
- 片山清夫編（1936），《大高雄建設論と市の現勢》。高雄：南海時報社高雄支局。
- 松村明編（2006），《大辞林（第三版）》。東京：三省堂。
- 渋谷隆一編（1989），《地方財閥の展開と銀行》。東京：日本評論社。
- 芝中一（1930），《新興の高雄》。高雄：臺南新報發行所。
- 高雄港勢展覽會編（1931），《高雄港勢展覽會誌》。高雄：高雄港勢展覽會。
- 鈴木常良（1919），《臺灣商工便覽》（第二版）。臺中：臺灣新聞社。
-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編（1932），《マラリア防遏誌》。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衛生課。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資料檢索日期：2026 年 4 月 20 日。網址：<https://dl.ndl.go.jp/pid/1146541>。
- 臺灣大觀社編（1923），《最近的南部臺灣》。臺南：臺灣大觀社。
- 臺灣新聞社（1918），《臺灣商工便覽》（第一版）。臺中：臺灣新聞社。
- 臺灣總督府（1907），《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明治 40 年 5 月）。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收藏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 臺灣總督府（1908），《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明治 41 年 4 月）。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收藏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 臺灣總督府土木局（1920），《打狗築港》。臺北：臺灣總督府土木局。
-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16），《台灣總督府園芸試驗場一覽》。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
- 鹽埕地政事務所，〈高雄市鼓山區鼓南段一小段 81 號〉，《日治時期建物登記簿》。

二、專書與論文

（一）專書

- 王御風（2019），《從淺野到臺泥：臺灣第一的水泥廠》。新北：我己文創。
- 王御風、杉森藍、吳孟青、黃于津、許聖迪（2017），《和風吹撫的港市：打造高雄日人的故事》。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 朱耀沂（2013），《臺灣昆蟲學史話（1684～194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李文環、蔡侑樺、黃于津、蔡佩蓉、余健源（2015），《高雄港都首部曲：哈瑪星》。臺中：好讀。
- 涂照彥著，李明俊譯（1991），《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人間。
- 張守真（1998），《哈瑪星的前世今生》。高雄：哈瑪星社區營造工作室。
- 張秀蓉編註（2015），《日治臺灣醫療公衛五十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楊玉姿、張守真（2004），《哈瑪星的文化故事》。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二）期刊論文

- 山内昌斗（2007）．〈英国サミュエル商会のグローバル展開と日本〉．《広島経済大学経済研究論集》．29（4）．頁 113-136。
- 吳明勇（2014）．〈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附屬園藝試驗場之建立〉．《臺灣學通訊》．80．頁 10-12。
- 李文良（1996）．〈日治初期臺灣林野經營之展開過程——以大嵙崁（桃園大溪）地區為中心〉．《臺灣史研究》．3（1）．頁 143-172。
- 松田利彦（2024）．〈帝國日本與腳氣病研究——以臺北醫院醫長稻垣長次郎為中心〉．《師大臺灣史學報》．16-17．頁 1-46。
- 林玉茹（2004）．〈殖民地邊區的企業：日治時期東臺灣的會社及企業家〉．《臺大歷史學報》．33．頁 315-563。
- 許峰源（2016）．〈戰後初期臺灣地區的瘧疾防治（1945-1952）〉．《臺灣學研究》．20．頁 69-110。
- 陳家豪（2013）．〈日治時期在臺日資與民營鐵道業之改革〉．《臺灣學研究》．16．頁 101-150。
- 曾品滄（2008）．〈炎起燄下薪——清代臺灣的燃料利用與燃料產業發展〉．《臺灣史研究》．15（2）．頁 37-78。
- 須永德武（2013）．〈植民地期臺灣企業的株主構成と収益性〉．《立教経済学研究》．66（4）．頁 47-72。
- 黃紹恆（1998）．〈日治初期在臺日資的生成與積累〉．《臺灣社會研究季刊》．32．頁 165-214。
- 趙祐志（2005）．〈日治時期日人在臺退職官吏與臺灣青果會社及青果同業組合的運作〉．《重高學報》．8．頁 119-142。
- 趙祐志（2007）．〈在臺日人菁英之家族觀與企業的繼承（1895-1945）——以 126 個繼承事例為例〉．《臺北文獻》（直字）．159．頁 33-89。
- 趙祐志（2009）．〈地緣網絡與在臺日人企業的經營（1895-1945）——以近江商事等十二個鄉土閥企業為例〉．《國際文化研究》．5（1）．頁 51-99。
- 趙祐志（2010）．〈日治時期在臺日人企業菁英的家閥與企業經營——以 107 個兄弟、伯叔侄關係為例〉．《重高學報》．13．頁 89-119。
- 蔡侑樺、徐明福（2011）．〈從公文檔案〈山田耕作官有原野豫約賣渡願許可〉書類談日治中期以後鳳山南麓之墾殖〉．《高雄文獻》．1（2）．頁 122-143。
- 謝濬澤（2011）．〈從打狗到高雄——日治時期高雄港的興築與管理（1895-1945）〉．《臺灣文獻》．62（2）．頁 211-244。
- 鍾淑敏（2004）．〈政商與日治時期東臺灣的開發：以賀田金三郎為中心的考察〉．《臺灣史研究》．11（1）．頁 79-117。
- 鍾淑敏（2018）．〈英商三美路商會（Samuel Samuel & Co., Ltd.）與日治前期臺灣的產業發展〉．《臺灣史研究》．25（2）．頁 97-143。

（三）學位論文

- 中川里江（2004）．〈臺灣日治時期日本民間企業發展之研究：以臺灣煉瓦株式會社為例〉。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慧瑜（2010）．〈日治時期臺北地區日本人的物質生活（1895-1937）〉。臺北：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翁靖傑（2010）．〈日治時期臺灣近代建築建築材料紅磚的使用之研究——以商標作為建築編年的初步探討〉。桃園：中原大學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論文。
- 郭婷玉（2021）．〈日本時代臺灣地方信用組合的運作與發展：以高雄中洲、興業信用組合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趙祐志（2004）．〈日人在臺企業菁英的社會網絡（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蔡佩蓉（2012）．〈壽山，誰的臺灣意象？日治時期公共空間的文化意涵之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
- 謝濬澤（2004）．〈國家與港口發展——高雄港的建構與管理（1895-1975）〉。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三、其他

- 〈「臺灣高雄驛前通」明信片〉。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資料，登錄號：KH2022.019.0018。
- 〈高雄左營舊城東門（鳳儀門）〉。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資料，登錄號：KH2017.019.011。
- 陳坤毅（2017 年 5 月 12 日）．〈[時光] 一張老照片看高雄第一間書店的故事〉。三餘書店官方網站。資料檢索日期：2026 年 4 月 20 日。網址：https://takaobooks.tw/html/magazine_info?me_guid=e84fc5deb26c。
- 須永德武（2012）．〈殖民地期臺灣的企業株主構成と財務結構〉。發表於「近代東亞的區域交流與秩序重編」國際研討會。國立臺北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暨日本立教大學經濟學部主辦（2012 年 5 月 26-27 日）。臺北：國立臺北大學人文學院校舍。
- 愛知縣政府官方網站。資料檢索日期：2026 年 1 月 26 日。網址：<http://www.pref.aichi.jp/global/ch/summary/profile/overview.html>。